

文化与传播研究丛书

kandejian De Shou Guoji Shijian Zhong De Chuanmei



文 化 与 传 播 研 究 丛 书

看得见的手

——国际事件中的传媒

赵雪波 等编著

大众传播也好，大众媒介也好，都与国际关系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到了今天，在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时代，它的身影和触须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已经是无处不在了。有的时候你无法辨别某一个国际事件究竟是一个受到传媒影响的事件，还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传媒事件。在一些国际事件中，传媒的影响和影子贯穿始终——从事件的发端，到进程和方向，再到事件的结局。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文 · 化 · 与 · 传 · 播 · 研 · 究 · 丛 · 书



看得见的 手

——国际事件中的传媒

KAN DE JIAN DE SHOU

GUOJI SHIJIAN ZHONG DE CHUANMEI

赵雪波/等编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得见的手:国际事件中的传媒/赵雪波等编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5
(文化与传播研究丛书)

ISBN 978-7-81093-597-5

I. 看… II. 赵… III. 国际新闻—传播媒介—研究 IV. G210 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2923 号

看得见的手

——国际事件中的传媒

赵雪波等编著

责任编辑 章建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次	2007年5月第1版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印次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邮编	230009	开本	710×1000 1/16
电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印张	13.5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字数	242千字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印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81093-597-5

定价:25.00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言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的身影、触须无处不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国际关系领域。有人把经济规律形容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与其相比，大众传播或者大众媒介就是一只看得见的手。这只手所挥之处总能刮起一股旋风。在国际关系领域里，这只看得见的手同样明显，而且有时更加明显。大部分人仍然把国际关系领域看做是一个比较封闭的领域，一提起国际关系这个概念，就会有一种讳莫如深的感觉，更不会把它与大众传播这样不相干的概念联系起来。其实，大众传播也好，大众媒介也好，都与国际关系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到了今天，在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时代，它的身影和触须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已经是无处不在了。有的时候你无法辨别某一个国际事件究竟是一个受到传媒影响的事件，还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传媒事件。在一些国际事件中，传媒的影响和影子贯穿始终——从事件的发端，到进程和方向，再到事件的结局。

从整体上看，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以不同的形式联系在一起。

首先是影响。许多事件的发生直接由传媒的报道引发，比如美军亵渎《古兰经》事件、凯利事件等等。有些事件的发生则可能间接地受到了传媒的影响，或者说传媒加快了事件发生的速度，比如科索沃战争、美西战争等等。在一些国际事件中，传媒成为积极的参与者，比如历次战争。传媒很早就已经开始介入战争报道了，从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是全面介入，到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战争已经离不开传媒了，而海湾战争之后政府和军方已经开始有“预谋”、有计划地利用传媒，处理与媒体的公共关系了。当然，媒体自身一刻也没有放松主动地去接近战争，它有的时候会对战争或其他国际事件的进程、方向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最典型的事例当属越南战争的结束，此外还比如美军在索马里军事行动的中止。

其次是在国际事件或外交决策中的参与。传媒参与一些国际事件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我们甚至不得不承认，任何的国际事件都会有传媒的参与，这

直接表现为大小媒体对各种国际事件的积极报道。如果这还不能被看做是参与的话，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媒体的表现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参与。在一些决策机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决策层已经注意到了在做出决定之前广揽各界的意见，这其中包括媒体的意见。媒体与外交决策之间的关系正在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

另外，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件中，传媒自身成为了事件的主角。虽然大部分情况下，媒体只是国际事件的旁观者、参与者，最多是一个配角，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传媒正在进入国际关系漩涡的核心。在美军亵渎《古兰经》、“虐囚门”等事件中，媒体既是导演，又是主角，而在丹麦漫画事件中，媒体完全演变为主角了。如果把传媒在国际关系中的整体表现集合起来，从更大的程度上讲，传媒已经是一种国际关系行为体了。传统的国际关系正在泛化，各种力量、角色纷纷进入国际关系，这最终改变了国际关系行为体的结构。

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关系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也不是用一两个事例能够说得清的。反过来讲，在许多国际事件中，分析传媒的因素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必须对每一个过程作具体而详细的分析，才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否则就是牵强附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有许多“定论”也有待我们去重新对它进行考究。比如，有一种定论认为赫斯特在美西战争的爆发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的人甚至认为赫斯特“发动”了那场战争。但是，美国总统麦金莱在决定发动那场战争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赫斯特的鼓动或暗示，这应该是我们追根溯源的方向。这种研究可能是一项艰难的工程，因为研究者不得不从决策者们的只言片语中去搜集信息。事实上，决策者们未必会承认他们的决策受到了媒体的影响，以表明自己在做出决定时是清醒的和有能力的。媒体也不一定会承认自己对某项决策或某个事件产生了影响，以免把自己推向风口浪尖。

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一种有特色的研究内容，但是研究什么呢？哪些内容、哪些事件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出于这种想法，本书提供了一些可供研究的范例，这些范例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国际事件。希望能够概括媒体与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比如媒体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媒体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媒体所构成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等。个别传媒虽然从表面来看只是一个实体，但是它包含了太多的国际事件、国际意义和国际关系，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国际关系现象，最典型的样本就是BBC。

国际事件浩如烟海，与大众传播和传媒有关的事例也不胜枚举，为了便于筛选或选择一些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的国际事件，本书所选事例的时间始

自 20 世纪 50 年代。所选事件突出了传媒在其中的表现，在每一个“故事”后面，编著者特别进行了评点，从自己的角度对这些国际事件进行了分析和思维延伸。

本书的策划、编著、出版工作从 2004 年就开始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今天才得以完成，一方面说明了文字工作的辛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编著者的不才。中国传媒大学“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们参与了全书的编写工作。编著者本人对所有国际事件进行了评点。本书的编著过程贯穿这些学生 3 年的学习时间，在他们即将毕业之时得以出版，总算是有了一个交代。

作 者

2007 年 5 月

目 录

序 言 (1)

1. 越南战争 (1)

在世界战争史上,越南战争是传媒报道最为出色的少数战争之一。越南战争是美国人民心头永远的痛,“越战泥潭”成为口头禅。然而,美国新闻媒体在这场战争中的不俗表现却是美国新闻界人士引以为荣的光辉事件。随着时间的延长,原先支持这场战争的较为一致的舆论开始出现裂痕,美国媒体的报道体现出走向理性反思和反战的倾向,从而在美国国内掀起更大规模的反战浪潮。约翰逊总统哀叹:假如我失去了克朗凯特,我就失去了美国大众。

2. 海湾战争 (19)

在现代战争中,军队必须战胜两个敌人,一个是战场上的敌人,另一个则是新闻界。在这场新闻大战中,CNN异军突起,一枝独秀。然而,CNN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是:是报道,还是宣传?CNN的结局是西方新闻媒体在战争中注定的结局。海湾战争中的战争新闻报道一样有着相同的特点,它继承了一种传统的模式:谎言、煽动、对真实信息的封锁、媒体与军方的斗争……

3. 科索沃战争 (33)

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北约和南联盟之间除了在正面战场上的交锋外,在另一个领域——新闻界,也展开了一场新闻大战。科索沃战争成就了“第一次网络战争”,使得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网络战区。各方力量都纷纷利用这块阵地公布自己的主张。在科索沃战事的报道中,西方各大传媒不约而同地结成“统一战线”。有利于西方的消息就给予报道,不利于西方的就全面封杀。在对科索沃战争的报道中,西方媒体都默契地和军方保持着一致的口径。

4. 伊拉克战争 (46)

美国为了抵制国内乃至全世界的反战舆论、给发动战争披上

“合法性”的外衣，做了精心的安排。伊拉克战争开创了几个第一：第一场电视直播的战争；第一场被各种媒体全方位报道的战争；第一次“创造性”地实行了“嵌入式”采访报道。此外，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破天荒地对一次国际事件——国际战争进行了全程直播，被学术界认定是与“非典”同样重要的对中国新闻产生变革性影响的事件。

5. 中苏论战 (61)

“中苏论战”是国际关系史上一场罕见的、史无前例的争论。无论是在时间的跨度上，还是在论战命题的思想高度上，或者是在组织性上和计划性上，它都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国际关系史上没有哪两个国家会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而唇枪舌战，而且一战就战了10年。这次论战检验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严密性和计划的周全性，锻炼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思想水平。

6. “国际新闻传播秩序”之争 (79)

“中心—边缘”结构贯穿世界历史。在旧的和现有的国际传播秩序中，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边缘和半边缘地位。西方新闻传播的文化策略就是“国际化”和“西方化”，以达到“文化渗透”的目的。但是，任何一种秩序都是可以改变的。国际新闻信息传播秩序的问题是一个国际关系的问题，是国际形势变化的自然结果。要想彻底改变国际信息传播旧秩序，首先就要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的资源分配、财富分配、权力分配的结构。

7. “死亡屋”事件 (98)

3名“游客”谎称自己是“美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将原来入境时的旅游目的变成了所谓的“工作考察”活动。在结束了为期数天的所谓“旅行见闻拍摄”之后，终于“满载而归”。不久，轰动世界的“秘密亚洲死亡屋”就播出了。“死亡屋”事件完全是西方对中国进行冷战的结果，是西方社会和西方媒体冷战思维的结果。“死亡屋”事件是一个国际媒体事件，只不过这个事件从头到尾是西方一些记者凭空捏造和“合理想象”出来的。

8. “中国威胁论” (106)

美国叫嚷“中国威胁论”有着一个明确而又一贯的目的，那

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要让其他国家都疏远中国;日本和极少数国家叫嚷“中国威胁论”,那是要浑水摸鱼;其他大部分国家附和“中国威胁论”,是因为对发展中的中国不了解、不信任。“中国威胁论”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令人鼓舞的发展前景。从新闻媒体的角度看,“中国威胁论”实际上是国际强势媒体与中国弱势媒体的一场大较量。

9. 中国“红客” (117)

“红客”(Honker)出现于1999年的中美黑客大战时期。“红客”号召打响“网络卫国战争”。红客的组成人员以年轻人为主,他们的成员中“65%是在校学生”。“红客”在本质上其实就是黑客。中美黑客的“红”“黑”大战,对中国的网络安全技术发展是一次推动。2004年,红客联盟宣布解散。这标志着红客已成为历史,也标志着一个国际事件的正式结束。“红客”和黑客已经成为网络的一部分,对国际关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0. BBC 的故事 (133)

BBC是英国的一家由政府资助但独立运作的媒体,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全球影响最大的媒体之一,按照英国国王颁布的皇家特许状和政府许可协议经营。在人事、财务等方面都受国王或政府的控制。但是,BBC的价值信条是“我们是独立、公正和诚实的”,由此导致与英国政府之间摩擦不断。BBC本身就是一个国际事件。BBC引发人们思考:一个私营的媒体就一定是自由客观的吗?一个公营的或国营的媒体就一定不能充分地报道事实真相吗?

11. 克林顿性丑闻 (143)

1998年9月间,引起全球关注的最大新闻无疑是“克林顿性丑闻案”的突破性进展。克林顿绯闻是由一个名叫麦特·德拉吉(Matt Drudge)的美国人的个人网站首先公布的。一夜之间,德拉吉网站成为全球最有名的新闻媒体。克林顿的尴尬让我们认识到政治领袖们,无论官有多大,无论是哪个国家的,都应该有一种风险意识,那就是一举一动都要受到公众和媒体的关注,犯了错误应该被追究责任。

12. “虐囚门”事件 (154)

阿布格莱布监狱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西约30公里的地方,阿拉伯语义为:怪异之父。2004年4月,媒体披露这所监狱里存

在美军虐待伊拉克战俘的丑闻。那个“诚实的揭发者”被美国军方称为“坏苹果”。丑闻引发了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强烈反应。美英当局深陷虐囚丑闻而不能自拔。“虐囚门”事件展示了媒体新技术的厉害。“虐囚门”事件也再次引发人们思考：真相重要，还是国家利益重要？

13. 凯利之死..... (167)

2003年7月18日清晨，警方在牛津郡的一处丛林中发现了一具尸体，随后证实，死者是英政府武器顾问凯利，死因为自杀。凯利自杀，原因并不复杂。凯利向媒体证实英国政府在伊拉克武器核查过程中做了假，为发动伊战制造了借口。但是英国政府拒不承认造假，媒体为了表明清白不得不把凯利供出来。凯利的压力加大，最后选择了自杀。凯利自杀，在英国政界和媒介炸开了锅，特别是把英国政府和BBC再次推向了针锋相对的风口浪尖。

14. 美军亵渎《古兰经》事件..... (180)

2005年5月9日，《新闻周刊》发表调查文章《军方内部调查显示关塔那摩监狱存在亵渎〈古兰经〉事件》。报道立刻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轩然大波，世界各地相继爆发抗议美军“暴行”的骚乱。白宫和五角大楼断然否认有亵渎《古兰经》的行为，认为对美军的指控都是“不可信的”。那位“知识渊博”的消息灵通人士也推翻了自己的言论，声称不确定在调查报告中看到有关亵渎《古兰经》的内容。《新闻周刊》被逼上了绝路……

15. 丹麦漫画事件..... (191)

2005年9月30日，丹麦《日德兰邮报》刊登了12幅系列讽刺漫画，漫画对穆斯林信徒的神圣真主进行了嘲笑。漫画不仅污蔑了穆罕默德，更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画上了等号。伊斯兰世界再次愤怒了。抗议、骚乱、围攻、绑架、爆炸、断交，整个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势不两立，文明的冲突一触即发。“丹麦漫画事件”是一个十足的国际性的媒介事件，事件带来了一个问题：到底是新闻自由重要？还是媒体的社会责任重要？

参考文献..... (203)

后 记..... (207)

越南战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是美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越战泥潭”成为口头禅。然而，美国新闻媒体在这场战争中的不俗表现却是美国新闻界人士引以为荣的光辉事件。因为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美国的新闻媒体使美国得以从越战的泥潭中脱身。

越南战争（1961年~1975年），简称越战，又称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由于媒体的介入，这场战争也被称为“第一次电视战争”。

一

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订之前，越南北方已全部获得解放，但北纬17度线以南的越南人民仍处在法国殖民统治者的统治之下。

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彻底将法国人击溃，法国人被迫从北部撤军。1954年，在讨论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与会各国签订了关于在越南、柬埔寨停止军事行动的《日内瓦协议》，《协议》明确表示要尊重越南等三国的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但美国拒绝在该协议上签字。

不久，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声称如果印度支那陷入共产党统治，东南亚其他地区将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很快陷落。鉴于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考虑，艾森豪威尔在法国撤离印度支那后开始大幅度援助及扶持1954年在南越建立的吴庭艳政府。

1956年春天，随着法国驻越南军队的撤出和印度支那法兰西联邦部队总司令部的解散，美国对越南的干涉更加赤裸。

1956年3月1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亲自前往西贡，同吴庭艳一起确定了继续在越南全国实行自由选举的方针。他还保证美国将在因此而引起的任何印度支那的危机中，对南越提供军事援助，以此来怂恿和鼓励吴庭艳集

团更放手地破坏日内瓦协议。

1956年6月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在“美国越南之友社”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公开宣布美国将继续给予南越军事援助，并且坚决支持南越政权拒绝参加有关越南统一问题的协商。

与此同时，美国进入南越的军事人员日渐增多，停战时，在南方只有200名美国军事顾问和军事人员，两年来已经增加到2000多名。

1961年5月，为防止吴庭艳政权垮台，美国派遣100名代号为“绿色贝雷帽”的所谓“特种部队”进入南越。

1962年2月8日，美国在西贡设立了由保罗·哈金斯将军指挥的军事司令部，标志着美国开始直接介入越南战争。4月30日，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宣布了一个名叫“战略村”的计划，随后，美伪军对各“战略村”进行疯狂的扫荡和围剿。

越南南方游击队进行了反“战略村”、反扫荡的战斗。据统计，从1962年到1964年，越南南方游击队的反扫荡斗争进行了40余次，美军伤亡达2000余人。到1964年，越南南方游击队解放了南方2/3以上的土地和700万人口，美国军事上严重受挫。

1963年11月1日，美国在南越策动军事政变，杀了吴庭艳，换上了新的傀儡杨文明，并积极寻找扩大战争的借口。

1964年8月，美国制造的“东京湾事件”是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第二个重要标志性事件。为了阻止越南北方对南方越共游击队的物资和人员支持，南越海军对越南北方沿岸海军基地进行袭击。美国海军也派出舰艇协助，进行电子战支持。1964年8月2日，一艘执行任务的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遭到越南北方鱼雷艇袭击。美国随即以轰炸越南北方海军基地作为报复，这就是著名的“东京湾事件”（也称“北部湾事件”）。越南北方和美国双方都视此事件为对方的蓄意攻击，并做出了强硬反应。越共游击队对多处美军基地进行了报复性攻击。越南北方325师进入南越集结，标志着越南北方正规军（也称越南人民军）对南越政权的公开进攻。美国国会则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可以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对付这一挑衅行为。这事实上给予了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在不经宣战的情况下发动战争的权力。

1965年4月3日和4日，美军在清化战役中遭受重创。从1964到1965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军和游击队机动作战，进行了一系列奇袭战、伏击战、攻坚战、围点打援和反扫荡战。据初步统计，南方军民共歼灭美军近6000人，超过1961年到1964年12月底所歼灭的美军总数的一倍。

1967年7月底，南越政府将武装力量增加6.5万人，总数超过100万，在8月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总统约翰逊也公开宣布，把美军在越南的布防人数增加到4.5万~5万人，到1968年，美军各兵种将达到52.5万人。

1968年对于驻越美军来说是一个分水岭，除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春节攻势”之外，媒体对美军屠杀平民的“美莱村事件”的集中报道，彻底打碎了美国民众支持越南战争的道义理由，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最终迫使政府从越南撤军。

美莱村注定要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1968年3月16日，美军一个连队在连长威廉·卡利中尉的率领下，进入越南广义省的美莱村，开始了持续几个小时的大屠杀。男人被迅速枪杀，女人被强奸后再杀掉，小孩子则被当作枪靶子。最后，整个村子109名村民无一幸免。战地记者西摩·赫什率先捕捉到这一难以令人置信的“惨绝人寰”的消息。不久，一份小报《圣路易斯报》以巨大的标题“在美莱：我们发疯了”刊登了他的文章。第二天，《华盛顿邮报》、《旧金山时报》等36家美国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在全美激起了大规模反战游行，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掀起反战高潮的作用。

如果说“美莱村事件”从内心上刺激了民众的反战决心，那么1968年1月末的“春节攻势”则让美国民众深切感受到赢得越战希望的渺茫。

1968年1月底，越南北方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春节攻势。超过8万的越南北方军队和越共游击队对南越几乎所有的大小城市发起了进攻，其规模和惨烈程度令习惯了威斯特摩兰（美军当时在南越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战报的美国人大为震惊：无数的军事设施和政府建筑被破坏；战斗最激烈的旧京顺化几乎全毁；美军溪山基地被围困76天，因为破坏太严重，解围后不得不放弃使用。在这次攻势中，越南北方损失了5万余人，但到了5月，他们就恢复了进攻能力。春节攻势使约翰逊不得不承认失败。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发表演讲，终止“轰雷行动”，表示美军将逐步撤出越南，并宣布放弃竞选下任总统。1968年6月，阿布拉姆斯（Abrams）将军接替威斯特摩兰指挥在越美军。

春节攻势之后，越战进入胶着状态，但形势对美国越来越不利。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调整了美国的亚洲战略，开始全面收缩美国的力量，因而在越南战场上也是边打、边谈、边撤。1972年3月，越南北方动员了几乎全部军事力量，发动了比1968年春节攻势更大规模的攻势。尼克松下令美国B-52战略轰炸机对越南北方进行全面轰炸。

1973年1月27日，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四方（越南、美

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西贡政权）在巴黎正式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随后两个月内，美军全部撤出越南。

二

1968年的春节攻势使越南北方在军事上也付出了较为惨重的代价，然而其最大成效在于“最终使美国国内政治同越南战争结合起来”，使美国的主流媒体发生了舆论风向转变，在美国国内酿成了一场公共危机（反战浪潮）。从1961年到1968年间，包括电视在内的美国媒体大多都热情地站在美国政府一边，行使着自己“爱国主义”的职责。而到了1968年的春节攻势后，电视带进千家万户的是血腥屠杀，原先支持这场战争的较为一致的舆论开始出现裂痕，美国媒体的报道体现出走向理性反思和反战的倾向，从而在美国国内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战浪潮。

在这场危机持续的两个多月里（1968年1月30日~3月31日），反战舆论空前高涨，反战运动风起云涌，美国公众对政府失去了信任，政府非常被动。“原先反对越战的人变得更加直言不讳，原先疑惑不定的加入了反战行列，而政府的许多支持者一下子转到了它的对立面”。1968年1月30日清晨，美国白宫收到了越共在越南顺化和西贡以北其他城市发动武装袭击的消息。当天下午，约翰逊总统就得到了西贡（今胡志明市）陷入战火而且越共士兵还攻入美国驻越大使馆的消息。针对越南北方的凌厉攻势，美军也发起了新年攻势。然而美军在反攻中并没有取得优势，相反陷入越南人民的丛林游击战中，寸步难行、死伤惨重，但是美国军方却宣布大获全胜。尽管从军事意义上讲，美国和越南南方赢得了春节攻势的胜利，但它所带来的政治和舆论灾难却成了美国在越南战争失败的转折点，直接导致了美国从越南撤军。因为越南北方尽管在战场上损失惨重，但在总体上却赢得了这场战争。越南北方经过45天激战，歼灭美伪军15万余人，沉重打击了美国的“逐步升级”战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沉重地说：“预料要进行一场长期、激烈和令人失望的斗争。”数日后，美军驻越南统帅部宣布，对越南北方的攻势业已停止，但美国战地记者的报道与军方宣布的消息截然不同。

在西贡战事爆发后的15分钟，设于西贡城内的美联社办事处便火速将这次军事进攻向全世界发出报道。这也标志着美国媒体对越南战争的报道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关于战争血腥场面的第一手报道能够及时发出。当时在越南的战地记者包括248名美国人和379名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员（其中

有 119 名越南人)。

在谈到这次报道时，美国的凯瑟林·特纳 (Kathleen Turner) 教授在她的“如何对战争进行报道”的研究中指出：“战争突然地、不可避免地降临到越南的新闻工作者头上，这种战争的零距离性保证了媒体能够具有充足的报道范围和对象。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生动的，也是易于接受的，而且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如此近距离地观察敌人。”

在越南战争新闻报道中，由于电视传播技术的发展，美国民众与电视镜头如此近距离的接触，扩大了战争给美国家庭带来的影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记者莫利·赛弗 (Morley Safer) 说过：“摄影机可以捕捉到所有由战争所带来的痛苦与灾难。悲痛的哀嚎，惊愕的表情，所有这些都真实地展现在荧幕上，并伴随着吃饭时间进入了千千万万个美国家庭。每一个描述战争的片段都毫无疑问地会激起人们的反战情绪，仅仅是因为它真实地传达了残酷的现实。在战场上，士兵并不是被击中心脏阵亡，而是被炸成了碎片，电视以它的镜头告诉了我们一切。”

在接下来的几周，战争的情况仍然没有好转。美国总统约翰逊新任命的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 (Clark Clifford) 列举了部分情况 (此前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任美国国防部部长)：

●2月18日：五角大楼报告一周内美军在战争中的伤亡人数——543人阵亡，2547人受伤。我们注意到一个令人不安的新趋势：这是开战后美军伤亡人数首次高于越南 (越南南方) 人民共和国军队。

●2月23日：政府宣布将继续征募48000名士兵，这是越战爆发后美军招募士兵人数的第二高。

●2月25日：美军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向美联社的记者宣布前线需要增派更多的部队。

在美国人民了解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他们也同样看到了电视报道中那些直观的、难以想象的血淋淋的镜头。尽管一项对1968年到1973年电视新闻故事的研究表明，节目中只有3%的篇幅是在报道战争，而且只有2%的死亡画面，但是在1968年越南农历新年期间 (1月31日~3月31日)，电视新闻中的暴力镜头比例不断上升。在一周之内，一个人只要收看联合新闻报道5次，就有3.9次看到平民伤亡的画面，这比一周看到0.85次要高出四倍多，而士兵伤亡的画面也从先前一周的2.4次一跃至6.8次。

媒体继续向美国国内公众发布令人不安的消息。美联社记者彼得·阿内特 (Peter Arnett) 引用了一位美军少校在战斗中的讲话：“现在有必要为拯救这个城市而先摧毁它了。”正如赫伯特·施坎德勒 (Herbert Schandler) 所

说：“这个屡屡被重复使用的句子似乎讽刺地总结了美国在越南企图运用其权力而产生的矛盾，并导致许多人对我们是否应该出兵越南产生了疑问。如果我们摧毁我们的朋友正是为了拯救他们，那么，对于我们双方来说，这种付出是否真的值得？”

如果约翰逊政府认为对“新年攻势”的负面报道过于尖锐和消极，那么他们自己至少也要负一部分责任。正如在1985年一项对媒体与军事关系的研究中指出的：

因为行政部门缺乏连贯的策略和简明的目标，但仍然宣称“有所进展”。发言人也无法对军方或公众解释何为最终的“胜利”。记者们则普遍假设其中有着某种连贯的策略，所谓的“进展”（歼灭敌军，安定平民，加强南越联盟）也在进一步实现这一策略。西贡的新闻工作者关注美国白宫的议程，他们试图一步步地配合官方发言人所发表的有关“进展”的声明，并且常常同深得美国军方信任的记者和南越的战地顾问们进行私下争论。

同一份报告还指出，尽管记者们在报道中遵循白宫的意见，但他们的评判仍然对政府的公告产生了大量的质疑。由于受到政府官员多年来一贯的乐观主义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西贡的新闻工作者尽职尽责地跟随着官方的口吻进行报道，但还是倾向于对官方发言人的所有乐观评价给予一定的保留。

对于这些，正如丹尼尔·哈林（Daniel Hallin）所注意到的：“记者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他所报道的政治过程中的一部分。如果他们认为新年攻势对于政府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失败的话，他们就会努力促成这种现象；如果他们不受新闻工作准则的制约，而新年攻势又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尽力不使政府卷入其中。因为大多数记者都相信他们的新闻工作直觉。”

无论事件的大小，似乎都会使政府的形象受到破坏。当美国白宫希望威斯特摩兰将军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言论能主导社会新闻报道时，公众的意志相反却集中在那些由美联社艾迪尔·亚丹（Eddie Adam）拍摄的或是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工作人员所报道的事件上。在西贡的大街上，南越的将军随手便处死了一名被俘的越共士兵，亚丹的照片就捕捉了那颗子弹发射时令人震撼的瞬间。这些连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对事件的报道，让美国人民看到了在越南所发生的事件的恐怖与血腥的本质。这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约翰·韦纳（John Wayne）所领导的那些与残酷敌人进行对抗的优秀士兵们。在这些事件中，那些一贯被认为良好的士兵们同样地处死战俘。这种不愉快的现实进一步刺激了美国民众，使他们产生了许多疑虑：我们的政府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威斯特摩兰也在后来写道：“照

片和影像震撼了整个世界，虽然看起来只是在这场大范围残酷战争中的单一事件，但其实是对美国人民心理的一个致命打击。”

在新年攻势开始的几天内，NBC 和 CBS 都进行了电视特别报道，新闻杂志《时代》和《新闻周刊》也进行了相关报道，并配以血腥的图片，其社论以及专栏文章都对美国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质疑。例如，沃尔特·李普曼在《新闻周刊》的专栏中写道：“战争转向了不好的一面，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现在正面对着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问题，认为它是荒谬的、不可思议的。我们在越南是不是被‘击败’了？这个问题的提出引起了一种震惊，这是一种感受到暴力的震惊，是一种无法估算后果的震惊。”而另一名记者沙丽娜·肯瑟斯（Salina Kansas）在她的社论中写道：“对于一个如此傲慢的国家来说，是很难承认失败和错误的。但如果我们是一个有着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正直而又高贵的民族，我们就不配再继续杀戮和破坏，因为这样只能使我们的罪责更加深重。”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 1968 年 2 月 27 日发表的一篇由沃尔特·克朗凯特从越南发回的电视现场报道，同沙丽娜为报纸所提供的消息一样，但其观众却高达数百万。克朗凯特在越南完成了近半个小时的报道后，发表了他的最终分析：在大规模的越南战场上，谁是胜者，谁又是败者呢？我不知道，越共并没有击败敌手而获得胜利，但我们同样也没有。也许历史会把它判为一场平局。

相反，美国政府则竭力使公众相信美军在越南战争中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撤退，而且国家对战争的态度丝毫不会动摇。但这种努力却遭到了另一篇新闻报道的冲击。这次意外事件是由 1968 年 3 月 10 日《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威斯特摩兰仍需 20.6 万士兵，激起政府内部争论”所引起的。这篇文章具有一箭双雕的功效，第一，这种向越南派出更多部队的请求使得公众对美国的战争政策产生了怀疑。第二，“政府内部争论”给公众留下了一个杂乱无序的印象，进而弱化了政策制定者在公众心中的影响力。美国《时代》的作者之一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提出：“从前的新闻使公众了解政府的计划，而同时对政府来说，仍然有时间去作出合理、及时的对应措施，但这一次却不一样。”

同一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高级记者弗兰克·迈奇（Frank Mcgee）用一段针对大规模军事增援前景的评述结束其联播：“那些应该被改变的可能只是破坏力的提高……不管其他的观点如何，是时候由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了拯救整个越南而摧毁它是否真的具有意义。”迈奇的评论同克朗凯特的评论一样，都是通过电视广播来影响公众的意志，从而激起人们对越战的厌